

陈德弟 / 著

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

传统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
李治安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秦漢至五代官私 藏書研究

李治安 主編

传统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



陳德弟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 / 陈德弟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6

(传统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 / 李治安主编)

ISBN 978-7-5528-0014-2

I. ①秦… II. ①陈… III. ①藏书—文化研究—中国
—秦汉时代~五代 (907~960) IV. ①G6259. 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2484号

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

陈德弟/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310 千字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014-2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秦汉时期官府藏书	38
第一节 官藏鸠集与度藏	39
一、官藏鸠集	39
二、度藏处所考述	46
第二节 官藏整理与编目	53
一、官藏整理	53
二、官藏编目	59
第三节 官藏流通与利用	68
一、官藏流通	68
二、官藏利用	71
第四节 秘书监的创建	74
第二章 秦汉时期私家藏书	78
第一节 私藏遭禁与弛禁	78
第二节 私家藏书考述	82
一、西汉私藏考述	82
二、东汉私藏考述	91
第三节 私藏文化的开启	97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	103
第一节 官藏收聚与典藏	103
一、三国两晋的聚藏	103
二、南朝的聚藏	110
三、十六国北朝的聚藏	114
第二节 官藏整理与编目	118
一、三国两晋整理与编目	118
二、南朝整理与编目	122
三、十六国北朝整理与编目	127
第三节 官藏流通与利用	133
一、官藏流通	133
二、官藏利用	137
第四节 秘书监制的发展	144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	148
第一节 私家藏书考述	148
第二节 私藏文化的演进	155
第三节 佣书业对藏书文化的促进	161
第五章 隋唐五代官府藏书	168
第一节 官藏搜集与贮藏	169
一、官藏搜集	169
二、官藏机构考述	192
第二节 官藏整理与编目	201
一、隋唐官藏整理	201
二、五代十国官藏整理	213



三、隋唐官藏编目	215
第三节 官藏流通与利用	223
一、官藏流通	223
二、官藏利用	230
第四节 雕印书籍的滥觞	239
第六章 隋唐五代私家藏书	242
第一节 隋代藏书家考述	242
第二节 唐代藏书家考述	247
第三节 五代十国藏书家考述	260
第四节 私藏文化的繁富	263
一、私藏来源	264
二、私藏文化繁富	269
附录	
表一：魏晋南北朝藏书家一览表	289
表二：十六国北朝藏书家一览表	306
表三：唐代藏书家一览表	312
表四：五代十国藏书家一览表	339
引用和主要参考书目	345
主要参考论文	350
后 记	356



导 论

—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中国几千年来,历遭磨难,几经沧桑,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中国的历史记录,从未间断,清晰地记述了我们的祖先创造自己文明的过程;中国的古籍文献,屡遭浩劫,但在华夏儿女的保藏、传承下,愈加孳乳繁富。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具有勤劳、勇敢、坚韧、睿智、崇尚文化的伟大品格。

我国流传至今的各类古籍^①,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在八万至十五万种^②之间,这些无法准确统计的古代文献,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录了我们的先人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的过程,记录了他们锐意变革、百折不挠、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历程,记录了他们嘉惠世界、至今为世人称奇的伟大创造,培育出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家、文

① 我们所说的古籍,是指公元1911年以前用文言文、繁体字所刻、写的反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资料 and 各类书籍。

② 方厚枢先生在《光明日报》(1962年3月6日)上撰有《从目录学入手》一文,其中估计“大约有七、八万种之多”,吴枫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一章第二节“文献积累”中再做估计,说“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八万种”,韩长庚先生在《中国编纂文集之始和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研究与流传》一文中又作估计说:“中国古代文献包括现存的和有目无书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万种,而其中尚存世流传可供披览检证的,也仍在十二万种以上。”(《韩长庚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而杨殿珣先生在《北图通讯》1979年第一册上所撰《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的文章,更估计在十五万种左右。



学家、医学家、高僧道师、能工巧匠,由此而汇聚成一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成长和发展史。那些充满睿智的哲学、军事著作,那些完备、深刻的伦理道德经典,那些厚积成败、借鉴资治的各类史籍,那些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杰作,那些超越时代的科技、工艺著述,那些治病救人、措理奇特的医籍药典,那些劝人向善、祈望寿康的佛、道经藏……无不饱含着华夏儿女的聪明才智。这些古代文献,历经千百年时空的转换和改朝换代的巨变,历经无数次兵燹和自然灾害的劫难,能够顽强地繁衍生息并薪火相传,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那么,它们是怎样被保藏、传承下来的?在我国古代,这些典籍文献是靠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这四大藏书系统传承的,其中官藏和私藏居主导地位,传承着华夏的文明。

所谓藏书,顾名思义,就是收藏书籍文献,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一种文化活动。我国古代,最早的正式图书是简策和帛书,在此之前,已出现了档案文献。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的需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书籍本身形质的变化,藏书活动由所有者最初的简单保藏、以备平素阅读和需要时查阅的一种行为,逐渐演变成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活动,包括搜求、鉴别、典藏、整理、分类、编目、借鉴、资治、编纂、传抄、刊刻、赏玩等等,它涉及了书籍文献的方方面面,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藏书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最早的藏书活动,肇始于官府藏书。在上古时代,最早拥有文化的人是统治者及其辅佐官员,如国君、各级贵族和辅助人主治理国家的卜祝、贞人、史官等等,这些辅弼人员将君王言行和重臣讲话以及国家所颁布的律令文书等记录下来之后,弃藏于官府,以备稽考借鉴^①,他们是中国最早学术文化的创建者,其学术文化活动

① (唐)魏徵等撰:《隋书》卷三三《经籍志》曰:“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7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亦均在各级官府中进行,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先秦金石文、传世文献《尚书》、《左传》等经史中的有关记载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所述诸子百家学派出于王官就是最好的证明^①,正因为他们拥有文化,所以才垄断了典籍文献^②。

我国上古时期,文字刚产生且能组字成文后不久,政府便有了保藏档案文献的举措,如河南安阳小屯村集中发现的带有文字的甲骨就是明证,正如《墨子·兼爱下》所云:“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同书《天志下》又云:“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但“藏书”作为一个术语,则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庄子·天道》中说:“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韩非子·显学》中亦云:“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同书《五蠹》中又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

① (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云:“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325 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又,(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28~1745 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又(清)章学诚在《章氏遗书·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中亦云:“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术艺,亦莫非世氏师传,未有空言著述,不隶官籍,如后世之家自为书者也。”

② 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谓:“古代学在王官,典籍为史官所专掌。”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7 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又,龚自珍撰:《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谓:“《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5 页。又,李宗侗撰:《中国史学史》谓:“古代王国典册皆掌于王官;列国者掌于列国之官吏;下至大夫,其家族的典册,亦为其族所私有。非官吏非独不能掌理,且不能学习,且亦无从学习。学必有师,师皆是贵族官吏,亦不肯授于外人。”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5 页。又,张尔田撰:《史微》谓:“诸子皆先王专官典守之遗,其始道术聚于职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 页。



被甲者少也。”同书《喻老》中再讲：“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箴。”这说明，当时藏书活动在社会上正逐渐流行开来。

图书是文字、知识和信息的载体。自从文字产生之后，拥有文化者便把许多社会活动契刻或记录在不同的载体上，如甲骨、钟鼎、陶器、玉石等，于是就形成了档案文献，人们有时把它们称作初始图书。严格地讲，这些刻有文字的文物，还不能算做正式图书，图书和档案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图书具有流通和传播知识的功能，而档案则否。

“图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籍《韩非子·大体》中：“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①由此可见，战国末期，普世对图书概念的理解和我们今日已相差无几了，这说明当时图书的功能已趋于成熟。

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我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其已拥有典籍文献，当然也就有了官藏。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所述黄帝至夏桀血胤世系，清晰明确，言之凿凿；在先秦古籍中，亦多记有夏朝之事。如《尚书·召诰》中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再如《左传》中十四次提及古《尚书》中的《夏书》^②，如《哀公六年》载：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又《国语·周语上》载：“《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同书《周语

① 所有与文献学有关的著述，甚至在国际互联网上，皆云“图书”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最早者是《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此学者失察也。

② 杨伯峻、徐提编撰：《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18 页。下据此书，版本相同，不再注明。



中》又载：“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同书《周语下》再载：“《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①《礼记·礼运》中道：“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同书《中庸》又载：“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同书《卫灵公》又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司马迁相信《夏书》是夏朝文献，并认为其所记真实，故在《史记·河渠书》开篇引《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他又在《夏本纪》后记中道：“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国语·晋语四》载：“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韦昭注曰：“典，法也。旅，众也。言有夏、商之后嗣及其遗法，与周室之师众。”《墨子·七患》引《夏书》曰：“禹七年水。”同书《非命下》又说：“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②从上述文献记载看，夏朝不仅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而且还拥有夏礼、历法等典籍文献。有的学者又根据商代的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推测，夏朝一定产生了文字。但是迄今为止，由于缺乏考古证据，还没有找到确凿的、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因此夏朝是否存在，就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坚信，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考古的发现，随着历史研究者不断地努力探索，夏朝的存在，定能得到证实。

我国上古文献《尚书·多士》中记载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① 读者还可参考李启谦所撰《〈左传〉、〈国语〉中所见夏代社会》，载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齐鲁书社 1985 年版。

② 参见詹子庆所撰的《夏史与夏代文明》有关章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学界据此认为,商代已经使用简策作为书写材料。“策”与“册”两字相通,《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北面立,戴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这段话本于《尚书·金縢》:“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又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道:“策,本又作册,亦作筴,或作箒。”^①从古文字学层面上看,简策在商代便已存在。甲骨文中,确实出现了“册”和“典”这两个字,册像用绳把写有文字的竹简联结起来;典像双手捧册放于几上。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曰:“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又曰:“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兀上,尊阁之也……筴,古文典从竹。”甲骨文、金文中还有尹、多尹、作册^②、卜、史、御史等负责记录的官员,《尚书》中多处讲殷商已有卜、史、巫、祝之官,由此可知,殷代的史官制度已有一定的规模。这些职称虽很难判断其具体职掌,但从周、秦的设官推测,大都与档案文献管理有关^③。

依据上述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材料记载,加之从如今全方位对商朝社会的深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推断,商代虽以甲骨为文字载体,但同时也使用简策作为书写材料,更确切地讲,商代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图书。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一文中说:“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为最广。”^④

① (西晋)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624 页。

② 王国维认为,“作册”即“内史”,见《观堂集林》中之《观堂别集》(下)卷一《书作册尹氏说》,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0~761 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③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云:“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第 904 页。

④ 王国维撰,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



之后的周朝,沿袭殷商书册制度,其官藏愈加丰富。在《礼记》中,记述了周朝以“方策”为文字载体,刊载政治文献。《礼记·中庸》中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唐朝孔颖达释“方策”为“方牍简策”,宋人朱熹训为:“方,板也;策,简也。”“板”即木板,“板”与“版”通,有字之版谓之“牍”,一尺见方之“牍”称作“方”,多简编联一起称为“策”,可见“方策”是竹木简的合称。《说文》云:“简,牒也,从竹。”又云:“牍,书版也,从片。”“片”就是剖开之“木”,从字形上看,简由竹制,牍以木成。而出土实物所见,北方出土之简多为木质,南方出土之牍也有竹制者,这表明简牍的材质,皆据自然条件因地制宜。

另外,春秋战国人常言往古“书于竹帛”。“帛”即“帛书”,又称“缣书”或“缣书”,就是用白色丝织物所写的初始图籍^①,如《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于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国语·越语》曰:“越王以册书帛。”《墨子·尚贤下》中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于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同书《天志下》又说:“书之竹帛,藏之府库。”又《韩非子·安危》中亦云:“先王寄理于竹帛。”另《吕氏春秋·仲春纪》中又载:“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所以,王国维认为:“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王氏判断大致不误。先秦时人所谓的“古者”、“先王”,皆指夏、商、周三代或三代的统治者,可见上古时期我国早期的书籍——简牍、帛

^① 帛书历代不见著录,1942年9月在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木椁里出土了一件帛画,有字有画,字为墨书古文字,共948字,内容大概是一些关于天文禁忌和神话故事;画主要用青、绛、朱三色绘成的各种神怪形象。据有关专家考订,该帛画年代当为战国中期或稍晚,参见李零撰《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共有28种,12万余字,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从此,人们才见到了真正的、成熟的帛书,参见自1980年以来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



书威已出现,所以《说文·序》云:“著于竹帛谓之书。”

我国上古时期,自从产生了原始书籍之后,掌管者就开始了保藏的活动。据《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这件事的真实性不可考,夏代负责文字记录的职官是否称作“太史令”亦不可考,但有一点应当可信,那就是我国发明文字、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者就开始收藏国家重要的“图法”^①一类的档案文献了。所以,夏朝负责记录、收藏、管理的职官终古,见夏将亡,携带这些象征国家政权的“图法”投奔了殷商^②。同书同篇接着又说:“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自从甲骨文出土,经学者结合传世文献进行广泛、深入研究之后,商朝已成为信史,甲骨文中已有“内史”一词,传世文献与商代出土文物相印证,说明殷商确有“内史”一职,负责掌管国家重要的档案文献。由此可见,殷商政府沿袭了夏朝的做法,也收藏国家重要的“图法”^③及其它档案文献。相传《尚书》原有数百篇,《诗经》有三千余篇,其中皆有商代史官所记录的初始文献。《汉志·书序》云:“《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同书《诗序》又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隋书·经籍志·书序》(以下简称《隋志》)亦云:“《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

① “图法”,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中释为“邦国之典制”,第6页。

② 夏朝拥有文献,在《论语》、《史记》、《汉书》中多处提及,故《隋书·经籍志》总结说:“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还可参看刘渝生撰《中国藏书起源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③ 殷商因袭了夏朝的许多典章制度,如《论语·为政》云:“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隋志》此语，当有所本，这充分说明，殷商官府已有藏书^①。

周王朝建立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需要，一方面继承了夏、商二代收藏图籍文献的传统，一方面完善了掌管图籍文献的史官制度，而且正式设立了国家的藏书处所。《左传》是一部记录先秦史事的重要古籍，其在《昭公二十六年》中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又司马迁《史记·老庄列传》中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可见周朝既有藏书，又设有管理藏书的官员。《史记·天官书》中载：“昔之传天数者：……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史佚，周武王时太史尹佚也。”《史记·周本纪》又载：幽王时，“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述其父司马谈的话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汉志》和《说文·叙》均言周宣王时有太史籀，无疑周设有太史之官。又《文选·张衡〈思玄赋〉》注引《古文周书》说，周穆王有左史豹^②。《逸周书》卷六《尝麦解》又言：周武王时，“大史策刑书九篇……太史乃藏之于盟府。”《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又《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惠王时，“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周之金文中也屡屡出现“内史”一职，或称“作册内史”，亦称“作命内史”，内史之长称作“内史尹”，或称“作册尹”^③，掌书王命及制录命官，参之《周礼·春官宗伯下》所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释》

①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旧事序》云：“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

② （梁）萧统编：《文选》（二）卷一五《张衡〈思玄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页。

③ 《观堂集林》中之《观堂别集》（下）卷一《书作册尹氏说》，第760～761页。



说：“或问《周官》府史之史^①，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周礼》记载的尽管不是周王朝所实行的官制，但周王朝设有掌管国家各种典籍文书的官员则是可信的，如果这种解释大致不错的話，周朝史官建置，可以说较前代完备了许多。

周之藏书处所有多种称谓，或称“策府”，或谓“周室”，或曰“藏室”，或云“盟府”，或名“天府”。《穆天子传》卷二记周穆王北征，“至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谓策府。”晋郭璞注：“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亦藏其策于府……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同书《六国年表序》亦称：秦烧天下之书，“而史记多藏周室，以故灭。”又《周礼·地官司徒》载：“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郑玄注：“天府掌祖庙之宝藏者；内史副写其书者。”同书《秋官司寇》又载：“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郑玄注：“天府，祖庙之藏。”由此可证，天府即宗庙，乃周天子收藏典籍之所。《隋志·书序》云：“孔子观《书》周室。”这里的“周室”，可能就是老子曾任职的“藏室”。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亦如周朝廷一样，既设有史官，又有自己藏典籍文献的处所，其中秦国是较早建立史官制度的国家。据《史记·秦本纪》载：文公十三年（前 753），“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另外，《左传》中提到晋有太史、左史、筮史、史；鲁有大史、外史；齐有太史、南史；楚有左史、史等。《左传·宣公二年》载：

①（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史释》注文〔二〕《周礼·天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郑注云：“府，治藏。史，掌书者。”又宰夫八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云：“治藏，藏文书及器物。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六官所属诸职司莫不有史，即后世所谓书吏耳。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33 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十四年》又载：“栾黶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乎？’”同书《昭公二年》又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同书《襄公二十五年》又载：齐崔杼杀死庄公，“大(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南史氏闻大(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同书《昭公十二年》亦载：楚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晋孙伯廌尝掌晋国典籍，因此，其后人改姓籍^①。《春秋公羊传注疏》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据说墨子曾“见百国春秋”，而且在《墨子·明鬼》中引用过《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和《齐春秋》。《国语·楚语上》曾载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同书《晋语七》也说过“羊舌肸习于《春秋》。”可知墨子曾说他见过百国《春秋》不诬也，春秋时各国皆有《春秋》。《孟子·离娄下》亦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晋、楚、鲁三国之史虽名称不同，但所记之事和记事的风格却是一致的。先秦的文献中，唯孟子说到晋之国史为《乘》、楚之国史称《梼杌》，而不名“春秋”，当是阅读过这三国的国史。

此时，藏书之处也多以“府”称。《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杨伯峻、徐提解释“盟府”道：“收藏盟约之所。”^②同书《定公四年》亦载：“其载书……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同书《哀公三年》再载：“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杜预《集解》说：“周人，司周书典籍之官。”《史记·封禅书》又载：“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

① 《左传·昭公十五年》载：“且昔而(著者按：指籍谈)高祖孙伯廌，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

② 杨伯峻、徐提编撰：《春秋左传词典》，第761页。